



抗战时期的大西南丛书

抗战时期 西南的文化事业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西南地区文史资料协作会议

之五

成都出版社



抗战时期 西南的文化事业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西南地区文史资料协作会议 编

成都出版社
一九九〇年十二月

责任编辑：史 唯

封面设计：黄 睦

版式设计：席维中

抗战时期西南的文化事业

成都出版社出版发行

(成都市十二桥街60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

四川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5.25插页6字数330千

1990年12月第1版 1990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000册

ISBN7—80575—140—4/K·10 定价6.50元

《抗战时期的大西南丛书》 出版说明

抗日战争是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反对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彻底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对于中国革命历史的发展具有扭转乾坤的伟大意义。西南是抗日战争的大后方，它为取得抗战胜利付出了巨大牺牲，作出了重大贡献。编纂《抗战时期的大西南丛书》（以下简称《丛书》），目的在于促进对抗日战争史的研究，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发展爱国统一战线，为统一祖国、振兴中华服务。

《丛书》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原则，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力求真实地反映当年西南地区全民全面抗战的情景和巨大变化，做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

《丛书》以亲历、亲见、亲闻史料为主，根据抗日战争时期大西南的实际情况，拟编辑出版七本书，即《大西南的抗日救亡运动》、《抗战时期内迁西南的高等院校》、《抗战时期内迁西南的工商企业》、《抗战时期西南的统一战线》、《抗战时期西南的金融和交通》、《抗战时期西南的文化事业》和《西南各族

EA47/04

民众对抗战的支援》。上述各书均由四川省政协、云南省政协、贵州省政协、西藏自治区政协、重庆市政协、成都市政协、昆明市政协、贵阳市政协及拉萨市政协的文史资料工作部门参加的政协西南地区文史资料协作会议编辑，并于1992年前陆续出版。

这套《丛书》得到各界人士和有关单位的大力支持，他们热情地为本《丛书》撰稿，分别供给上述协作单位汇编成书出版，实属费心尽力，对此，本《丛书》各协作单位深表谢意。

《抗战时期西南的 文化事业》

序 言

阳 翰 垒

在我们伟大祖国西南地区广袤的土地上，勤劳而智慧的各民族人民，同其他地区的人民一样，富有爱国主义传统和民族自强精神，曾共同创造过灿烂的古代文明。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七·七”事变，发动了大举侵华的战争后，中国共产党早已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全国各族各界人民，同仇敌忾，奋起抵抗外敌入侵。抗战初期，由于我沿海及腹地的大片国土相继沦丧，国民政府由南京西迁武汉再迁西南重镇重庆，并定此为陪都。同时，一大批文化机构、艺术团体、报刊社、图书出版发行单位和许多不甘当亡国奴的作家、艺术家、知名学者、新闻出版工作者等也纷纷疏散到大后方各省、市，同当地文化界的组织、爱国进步人士和广大民众结合在一起，为挽救国家和民族的危亡，为继承和发扬民族文化的精神，献心血，出大力。

国难当头，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和全民族抗战的正义斗争，极大地激发了荟萃于西南各地的文化界人士强烈的民族气节和爱国热忱。如火如荼的救亡运动，艰难困苦的战争年月，侵略者的

野蛮残暴，沦陷区人民的悲惨境遇，大后方国民党政权的黑暗腐败，社会生活中的种种弊端与落后现象等等，丰富了他们的创作源泉和工作内容；也使他们深感振兴西南文化事业和开发民智使命的迫切。国共合作，停止内战，举国一致团结抗日的局面，又为他们参加抗日救国和建设后方的各项事业发挥聪明才智，提供了较为适宜的时机与气候。在八年抗战期间，他们热烈响应中共“一切为了抗日救国”的号召，紧密地团结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一爱国主义旗帜下，并在周恩来同志为首的中共南方局的领导及地方党组织的关怀、支持、帮助和引导下，为贯彻党的“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方针，开展抗日文化工作而同心协力，并肩战斗。他们竭力克服了政治上、经济上与生活上的各种困难，呕心沥血，辛勤工作，围绕着抗敌救国、拯救民族，争民主反独裁，巩固与建设后方基地等主题或中心，分别从事写小说、编剧本、演戏剧、兴歌咏、搞美术、办报刊、出版发行图书等事业，积极宣传抗日，呼吁民主，歌颂英烈与真善美，批判假恶丑，讽刺、针砭时弊，以激发人们的爱国热情，激励军民斗志，从而在大后方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救亡图存文化运动。

抗战文化这一锐利武器，发挥了它特有的作用。一方面，它反映和促进了西南人民的觉醒和怒吼，坚定了人们巩固后方、抗战必胜的信念，鼓舞着无数热血青年踊跃从军杀敌，广大将士慷慨奔赴前线血洒疆场；后方民众忍饥受冻仍积极交纳粮税和捐献财物，用各种实际行动支援前线。另一方面，它促使和帮助西南的文化事业呈现出万紫千红的繁荣景象。一件件具有鲜明的中华民族性、人民大众性、现实艺术性和充满爱国仇敌内容的优秀文艺作品不断涌现；一个个抗日文化机构和救国益民组织、社团，如

雨后春笋般地产生与蓬勃发展。这一切为唤起我亿万中华儿女不畏强敌，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重，经受千辛万苦，英勇顽强地共同奋斗，极力反对和防止妥协投降，坚持把抗日战争进行到底，终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起到了不可低估的推动作用，并为后来西南地区的文化事业继续沿着爱国主义的、进步的方向不断前进与发展，也奠定了较好的基础，有着深远的影响。因此，它在中国近现代史和文化史上写下了极其光辉的一页。

抗战期间，我也是大后方文化大军中的一员，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的领导下，为联系、团结文化界人士，开展文艺界的抗日救亡运动和创作活动做过一些工作，至今思之犹历历在目。

现在，人民政协西南地区文史资料工作协作会议决定由成都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牵头，将目前西南各省市政协已征集到的抗战时期部分文化人与文化单位，坚持于大后方的艰辛劳动和所作贡献的宝贵史料，收集编纂成书，传之后世，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本书选用以亲历、亲见、亲闻者回忆录为主的史料40多篇30余万字，记述了这些文化界人士与单位当年从事各项文化工作与活动的不朽业绩。内容丰富多彩，翔实生动，基本上如实反映了抗日战争年代西南（但不包括当时的桂林等地）文化事业的一些概貌、主要方面与人物的光辉事迹。具有近现代历史研究和借鉴参阅的价值，也是振奋民族精神，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对当代人们特别是青年后辈进行爱国主义、革命传统教育和艰苦奋斗、勤俭建国教育的具体教材。就象我们这样曾身历其境的老年人，现在读起来仍弥感亲切，思绪万千。

当然，抗战文化的范畴甚广，内容颇多，一本篇幅有限的史料专辑很难全面系统深刻地反映，有待政协和其他有关方面同志进一步努力完善。

目 录

- | | |
|------------------------|-----|
| 《抗战时期的大西南丛书》出版说明 | 协作会 |
| 《抗战时期西南的文化事业》序言 | 阳翰笙 |

综 合

- | | |
|-------------------------|----------|
| 国民党统治区中共领导的文艺戏剧运动 | 张 纶 (1) |
| 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始末 | 胡绍轩 (12) |
| 昆明文协募捐救济贫病作家的活动 | 李何林 (34) |
| 在抗敌文协成都分会的工作见闻 | 洪 钟 (44) |
| 中苏文化协会活动见闻 | 李临风 (52) |

文学艺术

- | | |
|-------------------------|----------|
| 郭沫若在第三厅、文工会及其创作活动 | 翁植耘 (58) |
| 忆堂兄郭沫若抗战活动片断 | 郭开鑫 (78) |
| 怀念挚友、名导演应云卫 | 阳翰笙 (89) |

- 戏剧大师曹禺在国立剧专 李乃忱 (94)
老舍寄寓《新蜀报》的日子 潘康成 (103)
我在抗战后方琐忆 沙 汀 (107)
文化名人抗战时期在贵州的活动 宋洪宪 (127)
星文苑之荒 植后学之苗
——忆著名作家蹇先艾、端木蕻良在遵义 陈福彬 (138)
我所知的“中制”和“中电”两大电影厂(场) 陈兰荪 (146)
陪都戏剧春秋(六则) 董亚军等 (160)
回忆战火中诞生的孩子剧团 张 莺 (174)
悲歌一曲“扬州恨”激励万众爱国心
——川剧大师张德成在抗战期间 夏庭光 (182)
忆肖楷成与三庆会 廖友陶 (188)
忆四川旅外剧人抗敌演剧队 戴碧湘 (203)
四川抗敌文艺运动 秦 川 (219)
甜城内江的抗日文化运动 黄剑庆 (241)
抗战八年云南的戏剧运动(四则) 王耕夫等 (248)
活跃于后方的昆明儿童剧团 董林肯 (265)
农民救亡灯剧团亲历记 王旦东 (280)
我在后方巡回演出抗战相声 董长禄 (293)
抗敌演剧四队在贵州 魏 岩 (298)
贵阳抗敌话剧活动拾零 舒 明 (305)
大夏歌咏队在筑城 楚 林 (317)
抗战期中的四川漫画社 龚敬威 (325)
抗战爆发前后木刻运动在四川 丰中铁 (330)
木刻艺术战时在贵州的传播 陈耀寰 (340)

新闻出版

- 周恩来领导我们办《新华日报》 陆 治 (347)
抗日时期的四川报刊 向纯武 (359)
成都《新民晚报》历忆 吴亦兰 (381)
随抗战而兴旺的贵阳报纸 何静梧 (393)
“中央通讯社”贵阳分社片断回忆 马嗣英 (402)
贵阳《星期》周刊始末 萧 然 (406)
抗战中的昆明报业述略 万揆一 (414)
边陲救亡小报——《丽江周报》 张星泽 (421)
李公朴与北门书屋及北门出版社 王 健 (427)
抗战期间重庆的出版发行机构及图书业 唐慎翔 (436)
皖南事变前后的重庆生活书店 仲秋元 (451)
战时读书生活出版社在重庆 刘大明 (465)
编后语 成都市政协 (475)

国民党统治区中共领导 的文艺戏剧运动

张 颖

抗日战争在我国近百年的历史中，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这段历史应包括在国民党统治区为抗战胜利做出了很大贡献的文艺戏剧运动。

下面据我所知，就当时国统区中共领导和影响下的爱国文艺戏剧运动作一些回顾。

一、国统区的抗战文艺戏剧运动

抗日战争的历史，一般分为三段，即“七·七”事变到1938年武汉失陷为第一阶段；1939年国民政府搬至重庆到1943年底为第二阶段；1944年到抗战胜利为第三阶段。抗战文艺的分期大致也差不多，只是上限若追溯远一点可以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那时就有不少作家如田汉、洪深、夏衍等写了抗日的戏剧作品，其他作家写了不少文学作品。但如果从1935年“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算起，则特征更鲜明一些。这次运动中一个很大的

注：本文作者抗战时期曾在中共南方局文委、文化组工作，现系外交部离休干部。

特点，就是大部分的宣传形式都与文艺分不开，比如搞抗战歌咏、诗歌、戏剧、街头墙报等等，参加运动的学生也可以说是一支业余的抗战文艺队伍。“七·七”事变以后，全面抗战开始了，广大的专业文艺工作者——作家、画家、音乐家、演员很快就与业余的学生文艺队伍结合成文艺大军。那时的文艺水准是不高的，但他们有一颗火热的心，即全心全意为抗日救亡献出自己的青春，献出年轻的生命。

1937年秋，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进行全民反侵略战争。一开始中国共产党即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捐弃前嫌，改编红军为第18集团军开赴抗日前线，并相继派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叶剑英、王明等作为中共的代表来到国民党统治区，在武汉、长沙、桂林、重庆设立党的代表机构，从而改变了过去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只能进行地下活动的状况。在全国范围内，共产党的影响和威信得到很大的提高。长期以来国民党搞的反共宣传被揭穿了，人民对共产党有了全新的认识，特别是在知识分子和文艺界里，对共产党产生了极大的信任和敬仰。这种状况对国共团结抗战坚持到胜利起了很大的作用。

抗战的第一阶段，具有爱国主义精神的文艺工作者，都以极大的爱国热情和爱国行动，动员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奋起抗战。那时的报告文学、诗歌、歌咏、美术、戏剧等大量的作品，都是以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为内容的。以戏剧为例，抗战初期田汉、于伶、宋之的等就写了不少动员人民奋起抗战的剧目。演出最多、影响最大的要算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当时参加救亡运动的业余的和专业的戏剧工作者大都演了这个戏，影响是很大的。还有《保卫卢沟桥》、《民族万岁》等剧对唤起民众抗日都起了很大作用。据不完全统计，从1937年到1938年在重庆市演出过

的以抗日为内容的戏剧就有40多出，全国的数目肯定比这大得多。在戏剧队伍方面，周恩来在武汉时期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郭沫若任第三厅厅长以后，我们党利用这些公开合法的机构，团结全国的文艺工作者投入抗战，很多老文艺家都在三厅工作过，阳翰笙任副厅长，田汉、光未然、洪深等都曾在那里工作过。组织起了十个救亡演剧队、一个儿童剧团，深入军队、工厂、农村，宣传团结抗战。很多演剧队中，有共产党的支部，有些队长和搞政治工作的，都是我们的地下党员。

抗战的第二阶段，南京、武汉失守后，国民党迁都重庆，抗战初期的文艺大军就有了些变化，一些从上海辗转武汉、广州，到了重庆、桂林，一部分到了延安，有的仍留在上海。这就把统一的文艺队伍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在国统区，一部分在延安或敌后根据地。他们所处的环境与工作条件都和抗日初期不一样，但目标是一致的。在解放区的文艺工作者，出生入死经受了战争考验；在国统区的文艺工作者，则在相当复杂的环境中进行了尖锐的斗争，同样经受了严峻的考验。

现在，我想着重回顾一下第二阶段中的重庆雾季戏剧运动。准确一点说也就是从1941年的雾季到1944年的雾季戏剧运动。这一阶段较有代表性和典型性，可以说明国统区文艺戏剧运动的主要特点。抗战的第一阶段国共两党合作较好，共同抵抗了日本侵略者。但在南京、武汉失守以后，就发生了很大变化。特别是国民党内部出现了比较大的分化，汪精卫投降敌人，跑到南京组成伪政府，在重庆的国民党政府内也有一部分人无心抗战，存心反共，想借日本帝国主义之手消灭共产党。1940年以后国民党当局按其制定的《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对抗日民主与进步活动进行压制，竭力搞所谓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政府。在这个敌我相

持艰苦抗战的阶段，国民党发动了三次反共高潮，最严重的是1941年的“皖南事变”，围剿新四军，取消新四军番号；同时采取各种手段在重庆和其它统治区里镇压我党与人民的抗日斗争和民主运动。国统区出现严重的白色恐怖，许多要求进步的文艺工作者上了黑名单。一时乌云滚滚的黑暗局面，压得人们喘不过气来。这时中共南方局坚决贯彻党中央的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疏散在重庆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其中也包括文艺界的进步人士，有的到香港、昆明，有的到仰光、南洋一带。郭沫若、阳翰笙、陈白尘仍留在重庆。当时在重庆国民党机关里有职业的导演如史东山、郑君里，演员如白杨、舒绣文、周峰等。在白色恐怖下大约过了半年，到1941年的雾季，戏剧界就开始冲破黑暗惨淡的局面，整个文艺界也开始复苏了，重庆的话剧运动从此又发展起来，一直持续到1944年的雾季。在这4年中每年从10月到次年的5、6月，戏剧界极为繁荣兴旺，剧本创作、舞台演出都出现了丰收的景象。从数量上说，4年中新创剧目上演的有200多个。从内容上讲，除极少数外，可以说都是坚持抗战、民主、进步或反帝反封建的。

这一阶段的文艺运动与抗战初期不同，那时主要任务是动员人民群众起来为国家的独立而战，是轰轰烈烈的；而这时的文艺运动，在思想内容、创作题材、艺术水平方面都有发展。为了坚持团结抗战，反对分裂投降，争取民主，反对独裁，在那种特殊的环境中，在国民党的重重压力和审查的关卡下，文艺特别是戏剧走着一条迂回曲折、选择一个缺口进行突破的路。有研究中国抗战文艺的外国朋友说抗战时期中国的文学艺术，艺术性是很低的，没有什么提高。我则认为这个时期我们的戏剧艺术作品，也包括其它文艺创作，不仅富有思想性、战斗性，同时也具

有高度艺术性，不乏传世之作。

首屈一指的当推郭沫若。在最困难的条件下，郭老是文艺界一位大无畏的旗手，是有辉煌成就的历史学家、诗人，同时也是一位天才的剧作家。在20年代，他就以诗的形式写过剧本，在30年代上演过。到1941年，郭老的剧本《棠棣之花》首次在重庆演出，轰动山城。这个剧本，他在20年代就开始创作，30年代又为该剧补充了两幕，到了1941年，再次重新修改整理，才把这个剧完成。《棠棣之花》在诗情画意中写出了英雄儿女的侠义之情，在戏剧创作中独树一帜，别具一格。郭老的《屈原》，慷慨悲歌，气势磅礴。《雷电颂》的长篇独白，激动人心，澎湃的热情抒发了人民大众的心声，是被压迫的民族和人民忍受到极点而爆发出的雷电之声。郭老在一篇关于屈原的文章中说过：原来准备写的屈原是上下两部，时间跨越数十年，但在写作《屈原》剧本时，只写了屈原的一天，就描写了屈原伟大一生。《屈原》当然又是一部具有极高艺术性的不朽之作。屈原这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者的形象，直到今天还激励着人民继续战斗。怎么能说这样好的作品的艺术性低呢？这段时间是郭老创作的旺盛时期，他还创作了《虎符》、《高渐离》、《南冠草》、《孔雀胆》等剧本。也曾有人说郭老的历史剧是违反历史的宣传品，既不是历史，也不是艺术。这是不对的。郭老对历史剧曾这样说过：历史与历史题材的戏剧是两回事。这是很对的，戏剧终归不是历史，而是艺术创作，是可以在不违反历史的条件下让作者的思想自由飞翔的，对某些人物的描写，并不需要作历史考证。同时郭老的历史剧开创了借古鉴今的先例，那是被国民党严密控制下的层层审查逼出来的，是郭老走出来的一条路。

接着有阳翰笙创作的《天国春秋》，也获得了极大成功，这

是在特殊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一种戏剧形式。

夏衍在抗战期间也写了8个多幕话剧，如《上海的屋檐下》、《一年间》、《愁城记》、《芳草天涯》、《戏剧春秋》、《法西斯细菌》等，都在重庆上演过。这些剧本的内容是进步的，都是描写知识分子的，如大学教授、小职员、中小学教师等，写他们如何通过现实斗争、思想斗争锻炼，认识到人生的意义，投身到反帝国主义侵略的战斗行列中去。夏衍是一位现实主义大师，在这段时间里他的戏剧作品是具有高度艺术性的，较深刻地塑造了众多的知识分子的典型形象。

曹禺是世界知名的剧作家，他的剧本深得国内外同行和观众的赞誉。抗战期间，他先是参加了集体创作的《全民总动员》（此剧原作者系宋之的、陈荒煤、舒群、罗烽，后由曹禺、宋之的修改而成）。不久之后，又创作了《蜕变》，这戏在重庆曾多次演出，也受到了广大观众的欢迎，最后，被国民党政府禁演了。《蜕变》首次在重庆公演时，周恩来观看了演出，听到一些关于剧中主角梁专员的不同说法后，他曾经这么说：写国民党的官员，积极参加抗战工作不是很好吗？假如国民党中下层的官员都不支持抗战，那我们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就没有基础了吗？话虽简单，但值得我们深思。曹禺写的《北京人》和吴祖光写的《风雪夜归人》，当年在重庆演出也曾受观众喜爱，卖座率长期不衰。这两个戏虽不以抗战为题材，但它们的主题是反抗封建压迫，追求民主、自由和解放，揭露了封建社会的罪恶，对女性要求解放所经历的内心痛苦和斗争，表现得十分感人。经过40年的考验，直到今天，这两出戏仍然受到群众的欢迎，证明这些作品是有长久的生命力的。

重庆雾季戏剧活动，在极困难的条件下创作演出了数量非常